

海外工作十七年

梁子衡

(一) 國語句句聽得懂

我的故鄉廣東恩平，亦有「抓週」的風俗。孩子週歲的時候，父母用盤子擺上算盤、粉盒、書本等等要孩子選擇，以測驗其人生的志向。

我的「抓週」儀式聽說頗為隆重，原因是剛好父親在家，他並高興我的形相像他，胖胖的有點福氣。父親在「抓週」的盤上加上一條由香港買回來的「船」。這條玩具的船漆得紅紅綠綠，我一見到就把它抓着不放了。父親哈哈大笑，認為我會步他的後塵，走上半生海員，半生華僑的老路（我父親是旅加拿大的華僑）。但我村中的人並不如我父親這麼樂觀，只叫我做：「蛋家仔」（船伕）。

說也奇怪，後來我除了「逃婚」向內地走過一次桂林之外（因同姓結婚，父母反對，迫得我們兩口子遠走高飛），其餘的時間都朝海邊走：廣州、香港、上海、臺灣、東南亞，不坐船就是坐飛機。不過，我始終不是海員，也不是華僑；而是選擇了跟海員和華僑接近的海外工作。

民國三十九年我由香港回國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「歸隊」，奉派為中央第三組的總幹事。

岳母、妻、子女一共八個人，住在杭州南路宿舍八個「榻榻米」的房間。物質生活苦，而蓬勃的反抗精神生活甜。

我到差時，第三組主任鄭彥棻先生赴美訪問，由副主任李樸生先生代理職務。我第一次參加組務會報，一半廣東佬以廣東官話發表意見，別

有一番滋味。半年左右當我奉命訪泰，參加過僑社生活以後，我才體會到那番滋味便是「僑味」，一種別有風趣的「僑味」。我在泰京曼谷中華會館的歡迎茶會上演講，在場的僑胞說：「中央來這麼多人，國語說得最好的是梁先生，句句聽得懂！」因「語味」相投，受了一頓恭維，居家閒聊，每與孩子們談及，他們還偷偷的說：「爸爸不知羞！」

(二) 新嫁娘的心情

初踏進海外工作這一行，未免有一種「新嫁娘」的心情。儂倻「大家庭」充滿了蓬勃、和諧的氣氛，使我還沒有「嫁錯郎」、「入錯行」的感覺。

李樸生先生每天騎腳踏車上下班，一到下午四時便到我們的辦公室聊天，有時還把手一揮，率領我們到西門叮噶咖啡去了。後來鄭彥棻先生由美返國，辦公廳的氣氛便像由「軍校」開上了「前線」。

李樸生先生不愧為一位老童軍，他會牽着我們一班「童子軍的手」，飛躍於青山綠水間，以共舞共樂；鄭彥棻先生也不愧為一位名教授，他要大家在課堂裏嚴守秩序，勤力用功，做一個好「學生」。

我從事海外工作十七年，前四年在中央第三組，後十三年在僑務委員會。不過在民國四十九年起，我在僑委會只掛了一個顧問，中間會有兩年多回到第三組兼了一份工作。

我在僑委會曾任處長、參事、主任秘書和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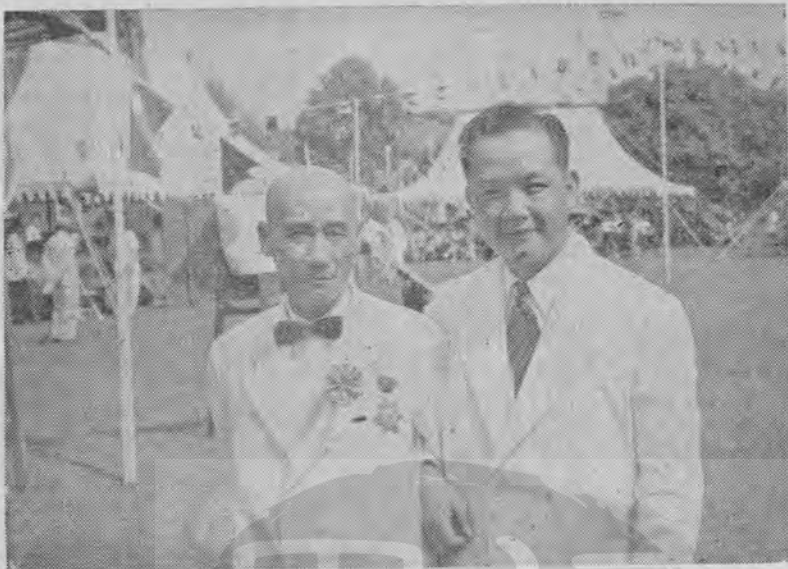
問。做過業務性的處長，也做過事務性的處長。這不是要搬我那「斬理不够四兩重」的「履歷」（粵語指微小），而是想說明我樣樣味道都嘗試過，加增我所說的話的真實性。

在海外工作領域上，歷盡滄桑一小兵，我想從幾位領導人物說起：我在僑務委員會經歷過四任委員長，與鄭彥棻先生相處較長；與陳清文、周書楷兩先生相處較短；與高信先生雖因掛一顧問而保持工作關係，但因「顧」而不「問」，得親教益的時間不多。

簡括來說：「鄭彥棻先生像一位前線指揮官、陳清文先生像一位大家庭的家長、周書楷先生像一位名教授、高信先生像一位羣眾運動的領袖。在鄭先生跟前必須養成自己是一個海、陸、空三棲的「戰士」，經常對人、馬、彈、藥及戰況記得爛熟，否則，你弄錯一點，準會被檢討，甚或吃上兩個「大飽」（粵語吃大飽是指被責難），但吃後會使你衷心感激，終身不忘。陳清文先生平易近人，你向他陳述工作時，他會跳上二郎腿，和你款款深談，間中加上一兩句廣東俗語（陳先生閩人而精粵語），像在酒席中吃過一味甜湯，清爽之氣直達丹田，使人有如對奕於青山綠水間的快感。周書楷先生滿腹經綸，無論開會或者閒聊，你休想空喊口號，妄空發炮。他常像教授一樣指出你虛張聲勢的地方。和周先生相處日

作者簡介：梁子衡先生廣東恩平人，

現任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秘書長。



谷曼於攝(左)氏生陶林領僑與(右)者作文本年十四國民

久，會使人由粗野轉為斯文，空浮變為沉實。高先生從政日久而無官氣，處事眼快、手快、口快。你跟他談公事，他會像「教練」指點「球員」作戰一樣，敏捷爽快，絕不拖泥帶水。高興時還拍拍你的肩頭，使你更勇敢地、更堅決地走上戰場。

(三) 三把刀一條線

許多人認為華僑是以三把刀(菜刀、剪刀、

剃刀)謀生海外。

如果說過去維持華僑社會生活是三把刀，而保持華僑與祖國的關係則為一條線——文化生活思想的線。有了這一條線，華僑向世界各地活動發展，是在大開大放中永不消失；似在消失中而又大開大放。因此，華僑社會在世界上像大廈中懸掛的無數彩燈，擊一燈而餘燈尚明；絕非像飄浮空中的汽球，一擊而全球破滅。

當我一接觸到海外工作的時候，即聽到「華僑社會變了！變了！」的一片呼聲！

毫無問題的，華僑社會是不斷在蛻變；大體來說，辛亥革命是一個變的關鍵；第二次大戰以後，殖民地主義沒落，新與國家紛紛獨立是一個關鍵；我們中國大陸淪陷之後又是一個關鍵。主要的因素：第一、是華僑社會受政治浪潮的波及而失去安定；第二、是各地文化、經濟、政治的狹隘民族主義對華僑社會的影響；第三、是民主主義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鬥爭中，人類憑其思想意向表現的趨向；第四、是工業社會代替農業社會後必然的歸趨；第五、是大家庭制度崩潰，小家庭制度興起後，華僑社會自然的轉變。

多年來，我曾多次說過一段話：「華僑社會過去在世界各地的地位，如大街小巷中的『住宅』，能靜亦能安；今天的地位却已被視為都市裏的違章建築，不能安亦不能靜！」

華僑社會蛻變的過程，充份表現出海外僑胞無可奈何的心情。他們一步一步回頭地轉進，他們在新舊轉變之間，甚像一對離別的情人，滴一滴淚，牽一牽手，咬緊牙關才走進一步。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，又相擁相抱，互相叮嚀，而

表露出彼此依依不捨的情樣。

我會以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兩語來素描海外華僑社會的浮沉。我說華僑社會頗像一片草原，一把火燒光以後，春風一吹，又欣欣繁榮起來。嚴格說一句：過去並沒有人對這草原作有計劃的「栽植」與「佈置」。但我們常見這草原上玫瑰盛開，櫻花燦爛，松柏秀勁，翠竹招展，一片風和日麗的景色。

(四) 田徑中的跳低欄

華僑社會的發展，初期如清溪流，輕漂漫進；後則如田徑中的跳低欄，段段緊張，步步艱難。

自我參加海外工作的時候，就是我強烈愛好研究華僑問題的時候，十七年來，我曾寫過「僑政概論」、「華僑社會研究」、「華僑政治生活」、「中國文化與海外華僑」幾本小冊子。臉皮厚、膽子大，一本本小冊子出版，這也是我一份熱心。

我對華僑問題的觀點，而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作戰。例如我在「中國文化與海外華僑」一書裏說過：「華僑社會的蛻變是漸變而不是突變；是局部變而不是全面變；是形式變而不是本質變。」但在最近創刊的「華僑天地」裏，我對華僑社會的展望，又改變我以前的看法，認為華僑社會轉變不只有漸變，亦將有急變；不只有局部變也將有全面變；不只有形式變，也將有本質變。

坐在辦公室來看問題，有如坐井觀天，當然看不出什麼。但我能够伸長頸子不斷的在看，這份心情足以對得起我本身的職務。

華僑問題的研究非常重要，如果對華僑問題的看法錯誤，施政就無法正確。例如許多人認為華僑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；我却認為華僑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，而非單純是一個政治問題。

我記得民國四十四年，我在師範大學僑生新聞專修科講「僑政」，曾因華僑國籍問題和一位越南僑生劇烈辯論。我根據「社會問題」的觀點主張自由選擇；他根據「政治問題」的觀點主張政府撤僑。最後由各種事實證明，自由選擇這一觀點較為穩妥。

(五) 鄉巴佬遊南洋

鄉巴佬遊南洋，可記的太多！限於篇幅，能寫的又太少。

我是十足一個「土包子」，我愛吃中餐不愛吃西餐；我愛喝茶不愛喝咖啡；我愛喝水不愛喝酒。更特別的，我不會穿衣服。中學時期，我嫂嫂給我縫做的「唐裝」（中國式短衫褲），調到可以藏下兩個人。同學們常鑽進我的衣服裏逗笑。有一天，隔鄰的孩子捉迷藏，竟把頭鑽進我的衣服裏藏起來，給我哥哥見到了，拿尺子把我的衣服一量，據說可「一賣開二」（一件可縫兩件）便把我嫂嫂臭罵了一頓。

我國四十年、四十五年兩度赴泰國，四十二年赴印尼，四十四年赴菲律賓，四十九年赴越南。中間往過的地方還不少。

我老是那兩套不是過長便是太短的西裝。一身「土包子」的打扮，配上滿口四邑口音的國語，就敢向海外闖，膽子似不下於百萬軍中尋阿斗的趙子龍。

我先後訪問過泰國兩次。泰國華僑社會以潮籍同胞為多。他們還保持着「功夫茶」那種「慢條斯理」，「不急不忙」的精神。四十四年在泰國曼谷中華會館被共匪燒死的音樂家朱永鎮先生，曾要我對菲、泰、印（印尼），這幾個地區華僑社會的人情味作一分析。我說初到菲律賓華僑社會，像新婚三朝回門的小姐，母親搔首弄姿，姐妹嘔寒問暖，人人像火球似的，熱辣辣滾在面前，既親切又溫暖；初到泰國華僑社會，像放學回到自己的家中，父母兄弟姐妹笑臉相迎。堂前用飯，後院納涼，書房誦讀，另有一種溫暖的感

受；印尼華僑社會則情趣特異，初到的人像置身於一所學校，同學用功於學習，互愛互助。假日旅行，課餘共樂，自然而天真。（我以上的看法曾發表於聯合報航空版）

泰國一面是皇宮巨室的奢華；一面是窮鄉僻壤的貧困。但滿佈於都市和鄉村的寺廟却調和着貧富之間的情緒，使這塊土地在任何戰亂中都能獲得苟安。

湄南河，殘陽夕照，少女飛躍，使人有紅袖添香之感。但它的裏面却在腐爛中。共匪利用泰國的人事、地理的方便，視為一個戰略的中心。當年，我曾預言這個地方的華僑將必有一天捲入戰爭的漩渦。

泰國華僑社會的形態，似可以故僑領雲竹亭老先生的家庭為「代表」。雲家在國籍上來說，有中國人、有泰國人（轉籍）、有法國人（眷屬）；在職業上來說，有大商家、有部次長、有外交官。農曆新年，家屬向雲老拜年要用跪拜禮；行禮如儀後又去跳舞喝酒。

(六) 耶加達、峴尼拉、西貢

「黃昏日落，印尼的婦女，穿紅著綠的擁在耶加達市內的小溪上。她們第一步是洗菜，第二步是洗衣，第三步是解手，第四步是沖涼（浴身）。五光十色的紗籠飄在溪水上，像一朵一朵出水芙蓉，少婦少女在嘻笑玩樂，又像多采多姿的嘉華年會。耶加達的外型現代化了，心臟地區仍保持着「一種東方農業社會的色彩。」

「印尼人生活在快樂與哀愁的夾縫裏，他們懂得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的道理，他們就這樣空出一些道路給我們華僑來生存和發展。」

以上是訪印後的一些舊筆記。印尼經過長期殖民地統治和地理上羣島散佈的關係，乃造成政黨多、政爭多的現象；而左右雙方的鬭爭也特別的國家為多。我訪印後，曾建議中央把當地黨的招牌自動

除下，在形式上撤退，在工作上加強，卒因種種的原因沒有依時實行。後來終鬧出「抓人封屋」的事件。

菲律賓華僑社會，舊的比別處舊；新的又比別處新；也有不新不舊的折衷派，以現代化的洋房安放祖宗神位和驅邪鎮鬼的菩薩。

先僑墳墓輝煌，這種驕傲無形中換來了許多嫉視和仇恨，而報復在後代華僑的身上。

我說過非華社會有三多：羣眾運動多、僑團開會多、華僑組織多。主要原因是當地華僑文教發達，僑胞財富充裕，能容納若干有學問、有作為的知識份子，同時也造成年青一代的華僑有一份向上進步的衝動。

越南，這個多難的地方。我踏上西堤的第一天即發覺那裏的單行道特別多，我便判斷這是一個好走極端的國家。過了幾天，我和朋友看電影在銀幕上見到吳廷琰那哭笑不分的臉孔，和走路匆急的神氣，我便說他一定橫死，並不斷帶來災難。我因此一說，乃被稱為「名相士」。

我這篇回憶很少寫到自己的工作，主要是怕被人罵為「丑表功」。但坦白的說，我在越南工作的成敗各半。可是得罪了朋友真不少。有一次我責難了幾位「同志」，他們推簡繡山先生來向我抗議，說他們幾十年沒有受人罵過，却給我不客氣的「教訓」了一頓，他們感覺不高興。我當時對簡先生這樣說：「請你告訴大家，他們要高興，請中央派薛覺先、馬師儒來演戲好了。」（薛、馬乃廣東名伶）

(七) 結語

越南華僑社會比其他地區華僑社會變得崎嶇，變得慘淡。但可能因此在地生長的根更強固、更久遠。

十七年來一瞬而過。我還在海外工作這園地上耕耘着。耕耘、耕耘，默默地、靜靜地耕耘。我週歲時抓了一條船，已決定了一生的志趣了。有什麼能比在自己所喜歡的園地裏耕耘來得更快樂呢？！